

古典文献学 理论探索 与古籍整理 方法研究

主编／朱崇先

副主编／黄延军

民族出版社

古典文献学 理论探索 与古籍整理 方法研究

主编／朱崇先

副主编／黄延军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文献学理论探索与古籍整理方法研究/朱崇先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105 - 12587 - 6

I. ①古… II. ①朱… III. ①古文献学—文集 ②古籍整理—
方法研究—文集 IV. ①G25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479 号

策划编辑: 罗 焰

责任编辑: 张 华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市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 448 千字

印 张: 22.25

定 价: 6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587 - 6/ G · 1854(汉 880)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前言

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被批准建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以来,民族古籍整理与民族古典文献研究作为该专业硕士点的研究方向进行招生,在教学中曾开设中国古典文献学、校勘学、目录学、民族古文献概览、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民族古籍文献调查研究方法、翻译理论与实践等古典文献学课程,积极主动地指导学生从事民族古籍文献整理实践和古典文献学理论的探索。民族古籍文献专业方向的师生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的多项科研项目,对有关民族古籍文献展开多层次的课题研究,不断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古籍文献馆藏部门进行专业调查。其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特色在于将古典文献学及其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翻译实践密切结合。对民族古籍的文史资料价值和开发利用前景进行深入考察和系统全面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对现代化条件下如何利用高新技术加强民族古籍文献的抢救与保护以及古籍文献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探索,为国家抢救和整理民族古籍政策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材料。通过近30年的教学科研,建成了系统、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培养了一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以及研究生班学员和国内外进修生,向民族古籍文献教学科研部门和单位输送了一大批高层次的专业人才。长期以来,在民族古籍整理与古典文献学的课程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开设民族文字古籍方面的诸多课程,不仅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和应用古典文献学知识的能力,而且加强了学生民族古籍文献的实际解读能力,加上翻译注释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使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在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科研方面具有扎实的功底。

在民族古文字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中央民族大学有着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中,一直遵循“语言、文学、文献并重”的理念,经过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获得批准建立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力度。为了更好地推动和促进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发展与民族古籍文

献学科的建设,应该充分认识自己所具有的优势和不足之处。一方面,我们与其他兄弟院校的同一专业和专业方向相比,中央民族大学的特色在于既注重古典文献学知识及相关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和古籍文献整理研究能力的培养,又强调学生熟悉一种民族语言文字,以培养精通民汉双语文的古籍整理人才为目标;另一方面,中央民族大学在以往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由于需要开设大量与民族古文字和古籍文献相关的课程而使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有所减少。因此,在民族古籍的实际整理方面能力较强,而古典文献学理论探索方面有所不足。加之本专业师生的学术交流多数局限在民族古文字和民族古籍整理的圈子之内,极少与其他院校的古典文献学专业师生进行学术交流。鉴于上述情况,为了加强中央民族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切实促进学科理论建设和提高专业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有必要积极开展中央民族大学与兄弟院校及科研院所相关专业之间的学术交流。为此,经过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的精心策划,于2010年5月中旬举办了以古典文献理论与古籍整理方法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以专题报告、宣读论文、自由发言等形式,对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古籍整理人才培养模式、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古籍整理的理论与实践、古籍整理中的现代技术应用、古籍整理的田野调查方法、古典文献学专业课程建设、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材建设、民族古籍文献的开发利用、古典文献学专业教学法等一系列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本专业的在读博士、硕士不但为会议做了热情周到的服务,而且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在会务工作和学术交流中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提高。

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内容丰富,涉及古典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涉及古典文献学专业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法,其中不乏古典文献学界前辈大家的精品力作,有不少中年专家教授的最新成果,也有许多青年学者在孜孜以求、勇于探索中有感而发的习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展示了古典文献学理论和古籍整理方法以及古典文献学专业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了保存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以便在今后的教学科研中参考借鉴,将会议论文编辑出版。

本次会议的圆满成功和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文日焕教授、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钟进文教授和副主任周国炎教授的鼎力支持,也得到张公瑾教授、胡振华教授、贺希格教授、季永海教授、孙钦善教授、崔富章教授等校内外资深专家的热情指导和校内外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还得到了出版社领导给予的大力支持。

编者

2011年3月25日

目 录

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 孙钦善 1

善本释名

..... 崔富章 13

文学文献·文化背景·版本研究

..... 刘 明 28

关于地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点思考

..... 郝明朝 魏代富 44

民族文字古籍下限之我见

..... 黄润华 51

浅析民族古籍的特征及价值

..... 王海滨 57

浅析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检索方法

..... 李 雪 63

论马学良先生与彝文文献译注研究范式的创立

..... 木仕华 70

论藏文古籍整理中的几个问题

..... 徐丽华 90

彝文古籍及其研究价值

..... 朱文旭 101

彝文古籍文献翻译规范性问题述略

..... 胡建设 111

回回文献《回回馆译语》

..... 胡振华 122

《明堂灸经》的西夏译本

..... 聂鸿音 133

二十四史中亚(广义)资料维吾尔文译注工作概述

..... 陈世明 147

彝文与彝族布摩

..... 王继超 150

新旧唐书李商隐传“三十六(体)”为“三才子”讹误考

..... 莫道才 158

明刻本彝文《劝善经》多种版本的异同比较

..... 杨怀珍 166

布依族宗教典籍中的文字

..... 周国炎 177

《韩国文集丛刊》研究札记

..... 闫 艳 194

为《经传释词》作笺注的意义及方法

..... 任晓彤 章 也 210

论彝文叙事长诗《雪峨传说》的艺术特色

..... 李生福 许 颖 216

高校古籍版本学教学探析

..... 史明文 221

从灰姑娘型故事源流浅谈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 黄 鑫 226

古壮文典籍《𠵿𠵿布洛陀》蕴含的宗教文化内涵

..... 莫柳桂 236

以文献学视角探析彝族祭祀仪式中的歌词与仪式生活

..... 李一秀 243

侗族文化的核心

..... 姚伦光 253

试论古典文献学的神话学视角

..... 冯金雄 264

《真理的入门》波斯—阿拉伯语借词研究

..... 姚利芬 274

浅谈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人才培养

..... 顾松洁 283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人才培养初探

..... 李 婷 290

略论古典文献学课程建设

..... 王净净 295

影响古典文献学专业学习的因素分析

..... 向彦婷 301

中国古典文献学学习方法之我见

..... 张九玲 307

浅论民族古籍整理对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意义	赵彦品 313
古典文献学学习方法浅议	韩子娴 319
构建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网络数据库	米热古丽·黑力力 325
彝文古籍数字化进程探析	薛钦文 331
试论畲族古籍文献和畲族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	黄倩红 341

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孙钦善

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在这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宝库中，以汉语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献典籍一直流传不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一般所说的中国古文献，实际指汉语古文献，本文论及的古文献，亦沿用此含义。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我国不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还有着不断整理、研究和利用这些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产生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论，逐渐形成了完整、科学的古文献学。中国古文献包括传世古文献和出土古文献，但以前者为主体。因此，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涵盖两方面，并且产生了两方面结合、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但历来侧重于前者。两者在古文献学上的内涵基本相同，而出土古文献有其特殊性，即在文字考释和材料拼合上，难度更大。

古文献学内涵的不断完善以及人们对古文献学完整、系统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西汉，刘向校理群书有所谓“校讎”之说（《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别录》），本指校勘，后来演进为校讎学，指校理群书、进行编目，已包括校勘学和目录学两方面的内容，见郑樵《通志·校讎略》及章学诚《校讎通义》。汉代又有“文章”或“章句”与义理相对之说，如刘向《晏子叙录》：“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王充《论衡·谢短》：“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可见汉代考据学与义理学已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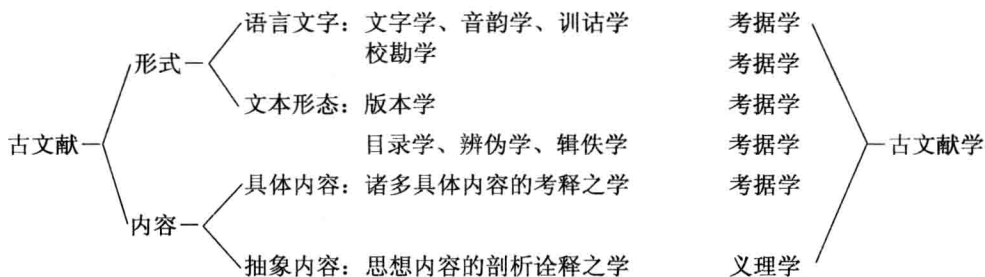
野。宋代对此有进一步认识,如该时期古文献学集大成者朱熹考据与义理兼重,言论甚多,如说:“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答孙季和》),又说:“才老(吴械)于考究上极有工夫,只是义理上看得不仔细”(《朱子语类》卷七八)。至清代,学术史已发展到更自觉的阶段,学者们非常注重总结学术的类别和经验,对于古文献学的全面内容以及考据学与义理学的区别和联系认识得更加明确。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认为治经与治史之法“小异而大同”,均有义理和考据两方面的问题,应以考据为重,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考据又包括校勘和考释的内容,他说:“经以明道,而求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又如戴震,更明确地指出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以及考据的具体内容和义理的探讨方法,他说:“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之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齟齬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氏)》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记)》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槩,毫厘不可有差。”(《与是仲明论学书》)这里虽就经书而言,但对古文献有普遍意义。文中所谓的道,属于义理,他认为只有从通晓语言文字入手,并且考清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法、乐律等具体内容,加以会通,才能求得义理。戴震对古文献的语言文字载体以及内容中的实体部分与抽象义理的认识,可谓已达到科学水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与发展古文献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人对古文献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古文献学相关著作的书名和内容看得出来。

从书名看,有的称“文献学”,但内容仅包括古文献学,文献有古有今,单称“文献学”,界说不清;有的称“古籍整理学”,而古籍整理学仅是古文献学的一部分,不能涵盖古文献的研究和利用,因此称“古籍整理学”,如果专讲古籍整理的内容未尝不可,如果用以称古文献学,有以偏概全之嫌;有的称“历史文献学”,内涵有歧义,有的“历史”与“古”字相当,“历史文献学”即指古文献学,有的则指所讲对象仅限于历史方面的文献,属于专科文献学,同一名称既然产生歧义,则名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容易产生混乱;有的称“文学文献学”,专讲文献仅限于文学方面,而且涵盖古今,亦属于专科文献学。从各书的内容看,一般都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标点、注释等内容,个别著作还把文献检索或抄纂(编纂)包括在内,其共同特点是皆未脱离古籍整理的框架。

笔者本人对古文献学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在长期的专业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逐步完成的。仅就近20年来说,也曾有过变化与进展。如1988年完稿、1994年出版的拙著《中国古文献学史》,在“绪言”中说:“概括言之,古文献学是以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它的各个环节如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为骨架,构筑了所需要的古代语言文字、古籍目录版本、古代历史文化等有关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又说:“古文献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关联。同时古文献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释(包括字词的注音释义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证辨析)、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古文献学不仅为研究整理古典文献典籍的专门学者所必修,对于古代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史料的驾驭、精通和考辨。甚至对一般需要阅读古书的人来说,知道一些古文献学的知识也是必要的。因此古文献学又带有基础学科的性质。”这里虽然讲的较全面,不局限于古籍整理方面,但仍未摆脱以古籍整理的环节为主干考虑问题。后来笔者的认识有了进展,在《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文章中(1996年4月在台北“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宣读,收入《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江苏古今出版社出版)又专从古籍(概指古文献)形式和内容的角度,按古文献的内在规律,更完整地分析了古文献学的内涵:“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古文献学是个交叉、兼综的学科。古籍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

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之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之学。”这样对古文献学内涵的分析与阐述，就更加完整和系统了。为求明晰，图示如下：



此后在讲课中还从古文献利用的角度作了补充分析：古文献的利用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2006年5月出版的拙著《中国古文献学》的内容和章节就是根据上述1996年以来新的认识编排的，如第一章“绪论（古文献与古文献学）”，第二章“目录”，第三章“版本”，第四章“校勘”，第五章“辨伪”，第六章“辑佚”，第七章“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上）——总说·文字”，第八章“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中）——音韵”，第九章“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下）——训诂”，第十章“古文献的内容考实”，第十一章“古文献的义理辨析”。这样的结构反映了古文献学内涵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无论对古文献的阅读、整理、研究还是利用，都是适用的。

二

前面分析了古文献学的内涵，现在来探讨古文献学的意义。总的来说，古文献学不仅与古文献的整理、研究有关，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与全部古代学科（即传统所说的“国学”，包括古代文、史、哲、经济、法律、科技等）的研究有关，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古代学科的研究必须以相关的古文献为主要材料依据，而凡是涉及古文献，就存在准确利用的问题。如前所述，古文献的准确利用涉及古文献的全面搜集、科学甄辨和正确理解。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古文献学。

因此古文献学实为古代学科的基础。

关于古文献学对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指导意义不难理解，前人对不重视古文献学，对古文献乱加整理的情况和后果多有论述。如明代科举和王阳明心学酿成的空疏学风，古文献深受其害。顾炎武对此痛心疾首，说：“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日知录》卷一八“科场禁约”）又说：“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日知录》卷一“朱子周易本义”）他鄙弃八股文和抄袭元人注而成的科举读本《五经大全》，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日知录》卷一八《书传会选》）他一再指斥与空疏学风相伴的臆改古书之风，说：“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鲁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又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自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国号曰周）。其时废中宗为卢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日知录》卷一八“改书”）又同卷“勘书”一条说：“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曰‘环绪倚鉏’，乃‘环堵’之误，注云：‘绪疑作佩’；‘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误，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世，虽有善读书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讎勘，岂不为大害乎！”清代校勘名家顾广圻亦深叹后人妄改为书籍之厄（见《思适斋书跋》卷一《经典释文》校本卷首跋），其《礼记考异跋》也说：“校讎之弊有二：一则性庸识暗，强预此事，本失窥作者大意，道听途说，下笔不休，徒劳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疮痍。二者殊途，至于诬古人，惑来者，同归而已矣。”（《思适斋集》卷一四）近人鲁迅亦曾尖锐指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当然对于明人刻书、清人纂修《四库全书》、今人标点古书

均不能一概而论，是非功过尚需具体分析，但是鲁迅所指出的严重错误倾向确实存在。忽视古文献学，对古文献乱加整理而古文献亡，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已为古文献整理史无数事实所证明，值得我们深思，引以为戒。加强古文献学的修养，不仅可以提高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水平，而且可以端正古文献整理的严谨学风和科学态度，因此如前所说，是否重视古文献学，古文献学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古文献整理、研究成果的优劣，甚至关系到古文献本身的存亡，这实属客观、必然的因果联系，绝非危言耸听。

关于古文献学对古代学科研究的意义，前面已经笼统提到古文献学是古代学科的基础。现在按古文献学内涵的各方面逐一具体分析：

目录是治学的门径。由于我国传统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其在读书、治学方面的指导作用尤为突出，前人对此多有共识。如唐毋巽说：“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流，甄明科别，则先贤遗事，有卒代（即世，避讳改，下同）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旧唐书·经籍志》总序引《古今书录序》）宋朝郑樵说：“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通志·总序》）又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通志·校讎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清代学者有关言论更多，如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而下，讷明之焦弱侯（竑）一辈人，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伪谬也。”（《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条）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条）章学诚认为目录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讎通义》卷一《互著》）。又说：“目录一门，不过簿录名目之书，原无深义，而充类以求，则亦浩汗难罄。合而为七略四部，分而为经史百家，副而为释道二藏，其易言耶？……故曰学问贵知类，知类而又能充之，无往而不得其义也。”（《章氏遗书补遗·史考释例》）龚自珍在《六经正名》中曾就我国古代目录的创始之作《别录》、《七略》说：“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龚自珍全集》第一辑）这里把目录比作指路明灯。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又其《輶轩语·语学篇》“论读书宜有门径”条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

或天算地輿。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另外，目录可借以考察版本的源流，确定校勘的底本和校本，鉴别古书的真伪，考察古书的存佚、完缺和辑佚的线索，等等。

版本学涉及文献文本的考察和鉴别。读书、治学应选择版本，依据可靠的善本。如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研究古代学科需要具备版本学的知识和技能，不仅要懂得版本的鉴定，还要懂得版本源流系统的考证。特别是版本源流系统的考证为一般版本学著作所忽略，而对版本的选择和校勘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古代学科研究者应该重点掌握的。

校勘是借助有关的理论和知识，运用相关文献比对、综合考订的方法，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校正古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错误，包括字句的讹误、篇章的舛乱等，以期恢复文本的正确面貌。校勘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是取得正确文本的重要手段，是读书、治学存真求是的先决条件，诚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因此，研究古代学科必须具备校勘的知识和方法，能独立校正古书的错误。

辨伪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辨伪仅指关于书籍本身，包括名称、作者、年代等方面真伪的考辨；广义辨伪除此之外，还把关于书籍内容真伪的考辨包括在内。辨伪是一项鉴别史料的基础工作，诚如清人崔述《考信录提要·释例》所说：“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所赖达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伪，然后圣人之真可得，岂得尽信以为实乎？”又说：“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因此，对于古代学科研究来说，辨伪是一个首要的环节。否则会误用伪书，如现传《尚书》的25篇伪古文，有人竟当做真书引用。又如过去因为疑古过头，把真书误判为伪书而加以摈弃。至于对书中的伪事、伪说不加考辨，轻信援据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辑佚是从传世的有关文献中钩稽、辑录已经散佚的整部古书或现存古书中部分遗失的内容（包括完整的篇段和残章断句），前者称辑集，后者称辑补。辑佚不仅是古文献整理的重要课题，也是古代学科研究的需要。就某些方面而言，辑佚甚至可以说是整理或研究的先决条件，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如《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书很多，而且有不少大部头的书，如一百五十卷《旧五代史》、二百卷的《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又如鲁迅写《中国小说史》，先辑编《古小说钩沉》。再如研究古代诗文作家，没有别集传世的，要重新辑集；即使有别集传世的，也还有补辑集外佚作的问题。前人热衷于补遗，目的正在于此。以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为例，建档诗人近一万家，其中有集传世的仅有六百多家，被称为“大家”；无集传世的占94%，被称为“小家”。“小家”仅存零篇断句，散见于各类文献当中，他们的诗作几乎全靠辑佚所得来编定。“大家”的集外诗，也靠辑佚来补遗。明嘉靖间吕柟编《张子钞释》，文集仅一卷，其中所收诗悉自《宋文鉴》出，清乾隆间刊《张子全书》沿之，遗漏甚多。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广泛辑佚，从吕祖谦的《宋文鉴》、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吕本中的《紫微诗话》、阮阅的《诗话总龟》、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赵与时的《宾退录》、刘克庄的《后村诗话》续集、金履祥的《濂洛风雅》（以上宋代）、《永乐大典》残本、《诗渊》、朱存理的《赵氏铁网珊瑚》（以上明代）以及清汪景龙的《宋诗略》辑得诗80首，又从晁说之的《晁氏客语》，吕本中的《童蒙训》、《紫微诗话》，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陈景沂的《全芳备祖》辑得零句9则，编为一卷。（见《全宋诗》第九册）类似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即使有集子传世的作者，辑补佚诗也很重要，如唐代诗人高适的集子《高常侍集》，世传版本不少，但敦煌遗书中所存集外佚诗很多，这些佚诗对于诗作的校勘和高适生平平行事的考证，均具有重要价值。（详见《高适集校注》及所附《高适年谱》）辑佚又往往能满足校勘、辨伪等方面的需要。在校勘时，不少他校材料需要靠辑佚搜获；在辨伪时，因为古人作伪，往往依傍有关书籍的佚文，如果能辑得有关佚文，就容易发现作伪者是如何借助这些佚文妄加增益的，如前人辨伪《古文尚书》就是这样做的。至于辑佚与古代学科研究的关系，皮锡瑞所著《经学历史》第十章“经学复盛时代”在谈到清代经学的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其首，次为“精校勘”、“通小学”，由此可见辑佚之重要。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辑佚书时，肯定清代辑佚成绩的同时，还流露出对辑佚工作的轻视，他说：“总而论之，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此专家研究资料者亦不少。然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辑佚是繁复的考证工作，无论佚文材料的搜集、甄辨、拼合，还是材料出处的准确注明，都离不开翔实的考证，绝非如梁氏所说“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

古文献的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居于基础地位。古文献是用文字记载的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说，古文献是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因此，要了解古文献的内容，必须从弄懂语言文字入手。这样就决定了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的基础地位。语文解读包括认字、读音和释义，涉及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所谓传统小学，狭义指文字学，广义则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一般用其广义。从汉代起，小学就成为经学的附庸，小学著作被著录在“六艺略”中。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既是